

目 录

Contents

001	序 陆俭明
001	导 言 刘丹青
001	第一章 认知语言学与汉语研究 沈家煊
023	第二章 功能语法与汉语研究 张伯江
046	第三章 篇章语法与汉语研究 方 梅
070	第四章 “管辖与约束理论”和汉语语法研究 沈 阳
106	第五章 最简方案与汉语语法研究 邓思颖
123	第六章 基于事件的语义学理论 李宝伦 潘海华
143	第七章 形式语用学与显义学说——兼谈显谓与汉语配价研究的关系 蒋 严
171	第八章 认知科学与汉语计算语言学 袁毓林
199	第九章 语言类型学与汉语研究 刘丹青
229	第十章 语法化理论、历史句法学与汉语历史语法研究 吴福祥
253	第十一章 实验语音学与汉语语音研究 朱晓农
276	第十二章 生成音系学与汉语研究 王洪君
292	第十三章 优选论与汉语音系研究 蒋 平
312	第十四章 走进汉语历史音韵学的汉藏语比较研究 麦 耘
332	第十五章 历史层次分析法与汉语方言研究 谢留文
346	第十六章 社会语言学与汉语方言学的新阶段 游汝杰
368	参考文献

序

上个世纪 50 年代乔姆斯基(N. Chomsky)生成语法思想和理论的诞生,结束了以布龙菲尔德(L. Bloomfield)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一统天下的局面,整个语言研究发生了迅速的、巨大的变革,语言学领域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向多元、纵深发展的研究态势,逐步发展形成了形式、功能、认知三大学派,并分别孳生了众多的各分支学派,极大地推进了语言学各个分支学科的研究和发展。新的理论、新的方法层出不穷,甚至可以说让人有点儿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国际语言研究的巨大变革也极大地推动了汉语研究。语言研究的变革和迅速发展,反映了新时代的发展对语言研究的需要在越来越提升。

到目前为止,大家虽然初步认识到,语言,就其本体而言,它是一个声音和意义相结合的符号系统,是一个具有整体性、可分割性、规则性的变动着的结构系统;就其功用而言,它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赖以思维的物质外壳,是用来保存、传承人类认识成果和人类文明的最有效的载体。但是,大家也深深感到,目前人类对语言只看到了它冰山的一角,在认识上可以说大大小小的问题多如牛毛。亟需我们加紧对它的研究,首先是要加紧对母语的研究。就现有的认识看,语言研究大致或者说起码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对语言里的种种现象,包括语音、语法、词汇、语义等诸方面的种种现象,作出尽可能合理、科学的解释。第二个目的是探索人类语言的共性——形式派所探索的是人类语言句法运算系统上句法操作的共性;功能派所探索的是人类语言不同类型的蕴涵共性(implicational universal),即如果有 p,一定有 q 这样的蕴涵共性;认知语言学所探索的是人的认知活动和社会生活反映到语言结构上的共性,以及人从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所得通过言辞把这一认知所得表达出来这一过程的共性;在此基础上加深对个别语言特点的认识。第三个目的是为了应用,我们知道,任何领域的科学研究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应用,语言研究也不例外;在当前,语言教学(包括第二语言教学和母语教学,即语文教学),信息科技急需的

自然语言处理,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国家为保护本国利益而急需的有关语言的规范和标准,以及各个跟语言有关的其他应用领域,如立法语言和司法语言的规范,等等,都非常需要语言研究成果的支撑。

要实现上述语言研究的三方面目的,起码要做好三件事:

第一件事,要不断挖掘、发现、描写新的语言事实,就汉语来说,包括各个方言和不同历史时期的各个不同层面的语言事实。考察描写语言事实,那种普查式的调查当然需要,但更需要加强对语言的洞察力,开展以问题为驱动、有针对性的语言调查与描写。挖掘、发现、描写语言事实必须实事求是,切忌为了自己结论的需要而回避甚至扭曲语言事实。

第二件事,要不断更新研究分析语言的理论和方法。必须明了,在科学研究领域里,一种理论方法能为学者所认可并采用,是因为它解释或解决了原先的理论方法所不能解释或解决的现象或问题,但这种新的理论方法也并不是对所有现象或问题都能加以很好的解释或解决。因此一个科学研究者,不能满足于已有的理论方法,一定要根据研究的需要不断探求、提出新的理论与方法。这是科学研究得以不断发展的重要条件。

第三件事,就是要及时了解学科前沿理论与方法,以不断拓宽研究者自身的学术视野和科学思路,并力求尽快将它跟自己所进行的具体语言的研究“亲密接触”甚至“零距离接触”,以推进自身的语言研究工作。这里必须明了,人类语言的共性决定了在某种语言研究基础上所提出的理论方法对其他语言的研究会有借鉴作用。照抄不误固然不对,拒绝接受更是要不得。

刘丹青先生所主编的《语言学前沿与汉语研究》一书,正是为了让国内读者特别是年轻学子尽早了解语言学及其各分支学科的前沿理论方法及其与汉语研究“亲密接触”的最新进展而编写的。这是一本跨越了语言学众多分支学科的著作,它将对我国学者的语言研究,特别是本族语的研究,起到催化的作用。

本书各个章节,刘丹青在《导言》里已作了全面而又恰如其分的评介,我再说点什么就显得多余了。这里我想借此机会,就当前的汉语研究说点想法。

第一点,上面说了,当今世界存在着形式、功能、认知三大语言学流派。这三个学派,从表面看,彼此确实存在着不小的差异,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它们是完

全对立的,因为语言本身就可以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去观察、研究、分析、认识它。各派的研究事实上起着互补的作用,使我们更全面、清楚地认识语言。现在的情况显示,彼此正互相吸取,取长补短。这里我想不避重复,再复说一下我先前曾说过的一段话:不只语言研究的历史向我们表明,可以说整个人类科学研究的历史表明,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研究就是盲人摸象,自圆其说。原因就在于客观世界太复杂了,而人们来研究某个事物时,一方面总是出于某种目的,这种一定的研究目的本身就会影响我们对事物的全面认识;另一方面,某个具体的研究者还往往会受到其他种种因素(如当时科学水平的局限、研究者个人水平的局限等)的制约或限制,所以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有多大的学问、多大的能耐,都不可能对所研究的事物,即使是自己研究领域内最熟悉的事物,一下子就认识得一清二楚。科学上一个正确结论的获得,一项新的发现,表面看是某个研究者或某些研究者智慧与勤劳工作的结果,应归功于研究者本人,然而事实上在这一研究成就里凝聚了好几代人各种派别研究者的研究心血。没有先驱者的经验与教训,不可能有今日研究者的科学成就。科学研究是无止境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老要强调在科学领域内必须坚持多元论的根本原因。

第二点,从当今语言研究的走向来看,有两方面的研究必须给以充分的注意。一个方面是,多层面、多模块之间的互动、接口(interface)的研究,另一个方面是词语特征的研究与描写。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南北几乎同时提出了“三个平面”的问题(南方是胡裕树、张斌等先生,北方是朱德熙先生),这三个平面的思想立刻为汉语语言学界所接受,对推进汉语研究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正如袁毓林在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我们不仅应该分清语法的三个不同的平面,而且应该观察这三个不同的平面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应引起大家重视。无论从理论上来说,也无论从语言应用来说,都极需对语法和语音之间、语法和语义之间、语法和语用之间、语音和语义之间、语义和语用之间、词库结构和句法操作之间等种种互动关系或者说接口问题,以及这种互动所应有的限度和所受到的制约,开展深入的研究。

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就语言研究说,一个重要的趋向是逐步重视特征的

研究和描写。在语言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上都是这样。先说语言的理论研究,大家知道,在语言研究领域,最早讲特征的是音位学,接着是语义学;语法学里讲语义特征那是70年代以后的事了。当时把“语义特征”这个概念术语借用到语法学中,为的是做两件事:一件事,用以解释造成同形多义句法格式的原因;另一件事,用以说明在某个句法格式中,为什么同是动词,或同是形容词,或同是名词,而有的能进入,有的不能进入。发展到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理论,特征又给赋予新的含义。我们知道,简约,一直是乔姆斯基生成语法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从1957年的由核心句到非核心句的转换,到1965年的从深层结构到表层结构的转换,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GB理论,再到最简方案及其近几年的论述——众多的规则和原则逐渐都不要了,最后似只保留了“原则和参数”理论和“X-bar”结构模式;而提出了中心词(head)理论和特征核查(feature checking)理论,以及轻动词理论(light verb)和VP空壳理论(VP shells),并注入了新的研究课题——接口(interfaces)的研究。基本的句法运作是从基础部分(即词库)取出带有各种各样有关语义、句法特征的词项,进行来回合并(merge),如能通过特征核查(指中心语跟标示语,中心语跟补足语,在特征上吻合),由此生成的词项组合再去跟音韵接口,跟逻辑语义接口,从而最终生成我们所听到或看到的句子。最近乔姆斯基在Linguistic Inquiry杂志2005年第1期上发表的文章(Three Factors in Language Design)进一步提出通过所谓“探针(probe)”与目标(goal)的相互核查的办法,来简化原先的“特征核查”。总之,词语的特征的分析和描写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走上了“大词库,小规则”之路。现在再看自然语言处理与理解这方面的语言应用研究。大家都知道,自然语言处理与理解经历了基于规则的处理策略到基于统计的处理策略的过程,研究工作虽在一步一步向前推进,但都未能取得理想的效果。现在较为普遍地采用了C. Pollard & Ivag A. Sag所提出的中心语驱动短语结构文法(Head-Driven Phrase Structure Grammar,缩写为HPSG),该文法规则都是围绕中心语展开的,而其最基础的、普遍通用的原则是中心语特征原则,同时采用复杂特征(complex feature set)和合一(unification)运算的方法来实行计算机对句子的理解与生成。显然,其基本道理跟乔姆斯基的特征核查是一样的,最终也走上了“大词库,小规则”的所谓“词汇主义”(lexicalism)之路。语言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

殊途同归,最终都走到重特征的“大词库,小规则”这条路上去,这恐怕绝非偶然的巧合。

第三点,近30年来,综观整个科学研究,研究方法的基本走向是:

“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根据有限的事实进行假设→用新的事实加以验证→获得新的结论→再进行新的假设→再用新的事实验证→……”

如此循环往复,从而不断推进科学研究,以获得越来越接近普遍原则的研究成果。各学科领域的发展事实告诉我们,研究要有所突破,科学要有所发展,求实固然需要,假设更必不可少,而且特别在当前假设的观念普遍薄弱的情况下,可能是更需要强调的。科学研究的事实告诉我们,且不说理工科领域内,就是在我们语言研究领域内,无论过去和现在,许多重要的突破也都离不开科学的假设。汉语音韵学里的“零声母”假设,语音学里“音位”的假设,近来拉森(Richard Larson)等人关于“VP空壳理论”和“轻动词理论”的假设,在推动语言研究上都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而乔姆斯基的三项假设——第一,人的头脑里天生有一个语言机制;第二,人类语言具有一致的普遍性的语言规则(即“普遍原则”);第三,这种人类语言的普遍性规则是高度概括、非常简明的——更是在全球范围内极大地推动了语言的研究。因此,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科学的创造性工作的重要特色是,先有理论预言某些论据,然后由实验来确认它。”我国研究四维力学的著名科学家刘岳松教授也指出,“奇迹往往从幻境中诞生,世界上哪一项伟大的发明,一开始不都是一幅奇景”。(L. 岳松《四维力学》,学林出版社,2001)事实上,就汉语研究来说,已有的结论或看法,都只能说是一种假设性的结论或看法;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其中有的将会被证明可以确认为定论,而大多数的结论或看法,将会被修正,甚至被完全放弃。因此我们在研究上,必须坚持“继承,借鉴,怀疑,假设,探索,求证”这12个字,这可以说是科学研究能有所突破的必由之路,也是汉语研究能有所突破的必由之路。是为序。

陆俭明

2005年11月18日

于北京成府路蓝旗营寓所

导 言

刘丹青

中国现代语言学史有一个奇特的景观——许多汉语研究者,包括很多学术大师和后来的一些重要学者,都曾当过国外语言学著述的译者。我不知道世界上是否还有第二个国家有此景观。请允许我先花一些篇幅,来展示一下这幅景观的一些不完整的片段。

1940年,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三位合作翻译出版了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商务印书馆),并加了注释和补订。1952年,李荣编译了赵元任1948年的英文新著《国语入门》,以《北京口语语法》为名在开明书店出版。李先生等后来还译了帕默尔的《语言学概论》(商务1983),并与吕叔湘先生一起译述赵元任的《通字方案》(1983)。1962年,陆志韦指导其子陆卓元译出萨丕尔《语言论》(商务),并写下富有真知灼见的前言和校注。1964年,何乐士、金有景、邵荣芬、刘坚、范继淹合译的弗里斯《英语结构》出版(商务)。1979年袁家骅等翻译的布龙菲尔德《语言论》作为商务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出版,同年又有邢公畹等翻译的乔姆斯基《句法结构》问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次年(1980),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吕叔湘翻译的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台湾则有丁邦新翻译的该书另一版本《中国话的文法》)。两年后(1982),高名凯翻译的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出版(商务)。198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余志鸿译的桥本万太郎《语言地理类型学》,朱德熙以《高瞻远瞩,一空依傍》一文序之。次年(1986),吕叔湘82岁高龄之时,出版了与黄国营合译(沈家煊校)的美国斯托克威尔著《句法理论基础》(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再次年(1987),蒋绍愚、徐昌华合译的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面世(北京大学出版社,有2003修订版)。1989年,沈家煊翻译的科姆里(Comrie)《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出版(华夏出版社)。1990年鲁国尧、侍建国合译的薛凤生《中原音韵音位系

统》出版(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沈家煊、周晓康、朱晓农、蔡文兰合译的弗罗姆金等《语言导论》出版(北语出版社)。1995年是语言学译著的大丰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江蓝生、白维国合译的志村良志著《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和潘悟云、冯蒸合译的包拟古(Bodman)著《原始汉语与汉藏语》,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潘悟云、陈重业、杨剑桥、张洪明合译的高本汉《修订汉文典》,语文出版社出版了张惠英翻译的罗杰瑞《汉语概论》。2000年以来,重要著作的翻译仍在继续,如潘悟云、徐文堪合译的蒲立本《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中华书局2000年),石汝杰、岩田礼合译的贺登崧《汉语方言地理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龚群虎翻译的沙加尔《上古汉语词根》(上教社2004),等等。虽未翻译整本专著,但翻译了一些重要论文的也是代有其人,如王力译雅柯布森《语音分析初探——区别性特征及其相互关系》,胡明扬译菲尔墨《“格”辨》,陆俭明译梅祖麟《吴语情貌词“仔”的语源》,陆丙甫、陆致极译格林伯格《一些主要与词序有关的语法普遍现象》,张伯江译麦考利(McCawley)《汉语词类归属的理据》,等等。王士元的两本论文集也是分别由游汝杰等和石锋等集体分篇译出的。还有些学者以另一种方式引介国际上的语言学理论,就是将众多原著的精神经过自己的消化后用中国人更熟悉的方式并配以汉语的举例乃至自己的研究心得来介绍给国内读者。如徐烈炯《语义学》、《生成语法理论》(徐先生也译校了很多论文),蒋严、潘海华《形式语义学引论》、石定栩《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等等。

上面只是举例,提到的主要是以汉语研究而不是以外语研究或翻译介绍为主业的“兼职”学者。但这份不完整的名单已很耐人寻味。这里有作为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和学术大师的诸位前辈,有不同年代在社科院、北大、复旦等机构工作的众多重要学者,译者名单居然还能囊括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的全部六任所长。语言学翻译这项艰苦而又称不上荣耀的工作,吸引了这么密集的汉语学者群特别是权威学者参与,绝非出于一时兴趣之类偶然原因。译者们肯定深知保持汉语研究大门敞开的重要意义,才以如此大的精力投入这份“兼职”,还要以搁下手头的“本职”研究为代价。而这些译著的数辈受惠者,也会在自己的学术成长和研究实践中持久体味到译者们艰苦劳动的价值所在。再看一下这些

“兼职”译者的“本职”成就和他们在汉语研究学术史上的作用地位,不由人不想到他们的“本职”和“兼职”之间的关系,也让人对他们倾力投入这份“兼职”的热情多了一层理解。

春来秋去,斗转星移,而翻译苦差,代有虔敬传人,引介评述,仍是学林善事。当然,新的世纪,新的形势,我国语言学界的开放事业也面临新的需求,新的任务。

随着新一代学人外语水平的提高,有更多的研究者不仅希望从译著之管窥豹身一斑,还有能力通过原著了解相关领域或课题的全豹。这将大大拓展语言学学术开放和交流的广度深度。现在多家出版社推出国外语言学著作的原文引进版系列,正是为了适时满足这一需求。

另一方面,翻译、介绍终是舶来之物。新的理论方法研究路子能否用于、如何用于汉语研究,靠翻译介绍本身不能回答和解决。对于希望在汉语中验证新理论、尝试新方法的学者学子,那些偏重于学派学说来龙去脉的介绍评述,终究难免有雾里看花、隔窗听戏之感。学界呼唤另一种介绍——既能在语言学前沿品尝理论的原汁原味、见识方法的真刀真枪,又能看到新的理论方法与汉语研究的“亲密接触”甚至“零距离接触”。学术的发展也逐渐造就了展示这种“接触”的客观条件。内地的学者现在有更多机会走出去请进来深度接触国际语言学前沿,并进而将新的理论方法与自己的汉语研究实践相结合,也有不少在国外学成的学者回到香港等地从事汉语的语言学研究。比起国外的研究包括汉语研究来,这两批人通常更加了解国内的研究传统,更加知道国内需要什么理论方法来推进汉语研究,同时也比较了解哪些汉语现象具有更高的理论价值,可以用来推进人类语言普遍理论的建设。这些,为编著新型的(研究型的)理论介绍著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长期致力于推进中国语言学现代化、科学化、国际化的上海教育出版社,正通过多套丛书加大这种推进的力度,在很多语言学分支学科都有推出相关专著的计划(其中有些作者正是本书有关章节的作者)。但语言学发展相当迅速,而专著写作需要较多的时间。为了让国内读者特别是年轻学子尽早了解语言学前沿与汉语研究“亲密接触”的最新进展,上教社张荣先生与我接洽,建议我先

编一本汇集多个分支领域最新进展的著作,用不同的章节介绍有关学科的情况。为了凸显语言学前沿与汉语研究的接触深度,缩短作者和读者的距离,让读者感受到语言学前沿就在身边,我们商定此书的作者队伍全部由中国内地和港澳地区的学者构成。我欣然从命,也不无担心,因为我在根据自己的想法确定本书章节和拟邀作者后,马上想到“心仪”的各路高手都在教学、研究第一线肩负重任,不知他们能否专为本书之需拨冗撰稿?联系工作却出乎意料地顺利,学者们全都爽快地接受邀请愿意赐稿。于是就有了现在的这本集体之作。当然,同一领域的高手有多有少。限于篇幅限制,高手多的领域,由于联系方便的学者已经允诺了,就不再另请。

下面就从编者的角度对本书的总体追求及各个部分的特点作一些简要说明或导读。

本书希望论及尽可能多的在国际上影响较大发展较快的学派、领域或学说,同时也希望涉及的理论方法在汉语研究中已经有可观的成果或可见的前景。在介绍部分,尽量提供忠实于“原典”的介绍,避免让自己的主观观点扭曲相关理论的精神实质。在与汉语研究的关系方面,希望都有扎实深入的汉语研究作基础,并借助新的理论方法发掘更多的汉语事实和规律,而不是翻译式的“结合”——拍拍脑袋举几个与洋文对应的或仅仅勉强对应的例子;而且我们不反对在研究层面(而非介绍层面)用严苛的眼光对待甚至挑剔外来的理论,以汉语事实和规律的发掘为重,冀能通过汉语事实来检验、修正、改造、完善或超越现有的前沿理论;对于介绍性文献通常谈得较多的学派学科形成发展史、代表人物之类内容,本书原则上从简,而将篇幅用于带有方法方面示范性或实验性的具体研究成果。

功能学派与形式学派是当今世界上影响最大而又呈观点对立的两大学派。虽然形式学派在西方学界势头更大,但在国内,功能语法与汉语结合的研究更为兴盛。本书由沈家煊、张伯江和方梅分别撰稿的第一、二、三章,就是讨论广义的功能语言学与汉语语法研究结合的章节。

沈家煊和张伯江在各自章节中都从语言观上与形式学派的对立谈起,从这两章的语言观阐述部分(第一章的1~6节,第二章的第1节)的交叉和差异,很

可以体察认知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的关系。第一章开头简要说明了认知语言学从生成语法中分化出来的过程,体现了它在广义功能语法中一种特殊旁支的角色。但是,比较一、二两章的介绍可知,认知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在根本的语言观方面已经确立了很多共识,一起与形式学派形成对垒之势:最核心的是对语言能力先天性和语法自主性(或句法独立性)的质疑。这是两者能够同归一个大学派的坚实的语言哲学基础。在一些更具体的研究理念方面,两者也体现出了不少共同或交叉之处,如相信语言中原型范畴(典型范畴)的普遍性,不追求非此即彼的分类系统;重视语言表达中听说者的主观作用(认知语法中的主观性、主观化和功能语法中对言者、听者视角及两者交互性的重视)、重视语义对句法的制约等、将共时现象与语法化等历时现象结合的研究。进到更具体的研究领域和操作层面,则两者的差异也开始显现。比较一下这两章的后面部分就可以看出,认知语法关注(语言-认知的)“模式”,偏向语言系统的静态;而功能语法(尤其是第二章重点介绍的美国西海岸学派)关注(语言运用的)“过程”,偏向言语交际的动态。如沈家煊逐一分析的概念的层次、隐喻和转喻、突显、概念的合并与组合,乃至“理想认知模型”、“构式”,等等,似都可以用“模式”来概括。而张伯江强调的言语交际的“交互性”、不同语体(代表不同交际类型)对语法的影响、语法在使用中“浮现”成型的观念,等等,都突出了言语交际的动态。这种差异也造就了两者对语料的不同态度。关注“模式”的认知语法像形式语法一样倚重内省语感测试,包括对星号句的重视,多少体现了它与形式学派的历史渊源。而关注“过程”的功能语法更倚重日常交际的真实语料,喜欢从语篇统计中看问题,并且在研究中讲究语料的语体差异。“认知章”和“功能章”都有大量相当成熟的汉语研究成果做基础。前者显示,认知语言学的几乎每一个基本概念,在汉语中都有过扎实的专题研究,包括该章作者自己的大量成果和张敏等其他学者的研究。而后者所介绍的既有国外功能派主要学者如 T. Givón, S. Thompson 的一些经典成果,也有海内外相关汉语研究的成果,例如施事受事之类语义角色的语用属性、论元结构在语篇中的动态性。两章的内容清楚展示了认知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对汉语研究的有力推动和各自广阔的用武之地。

方梅的第三章所依据的篇章语法框架也属美国西海岸功能学派,所以不必重复语言哲学的讨论,作者可以从研究对象和方法的特点直接切入正题。篇章语法应是最体现功能语法特色的分支,讲究完全从真实语篇中研究语法。但国内学界对此领域的了解还比较模糊,有时跟话语分析或会话分析难以分辨。虽然它们都立足真实语篇,但研究旨趣有别。话语、会话分析的目的是要找出话语本身的组织结构规律,而篇章语法是要从语篇组织中寻找、发现语法的由来,解释语法现象的话语来源(所谓“浮现语法”),目的还在研究语法。国内真正从事语篇语法研究者很少,本章作者是这方面成果较突出的一位,读者可以从本章中领略篇章语法的独特魅力,例如对语言材料真实性的追求,对语境的重视,对语体分类的讲究(包括口语体内部独白与对话这样的区别都很重要),对信息结构的重视与系统性分析,对使用频率的重视,对共时语法化的关注。而汉语指称成分的分类与选用、某些句法成分的功能和句法结构的频率,甚至很多词化结构的来历,这些属于共时或历时句法的现象都可以在篇章语法中找到它们的根源或一定的由来。

以乔姆斯基创立的生成语法为代表的形式语法涵盖了句法、音系、语义、语用多个分支学科,本书关于其句法方面设有沈阳和邓思颖的四、五两章,分别围绕生成语法在上世纪80年代形成的“管辖与约束理论”(管约论、GB理论)和90年代提出的“最简方案”展开讨论。两者虽然有所区别,但本质上是同一种理论的不同阶段的修订版,其基本理念和追求并未改变。从两位作者不同角度和风格的介绍中可以看到,对先天的语言能力的强调,对普遍语法的追求,对句法自治(自足、自主)性的坚持,对形式化表述的重视,这些理念在生成语法中是一以贯之的。不同阶段的区别至多在于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途径。

沈阳所写的第四章的主体,是用管约论的一些观念方法来研究汉语句法中的一些重要现象,如空语类、移位、题元、同指约束等。乔姆斯基理论从上世纪60年代最先被简要介绍进国内,到80年代以来他的诸多著作被翻译介绍,至今也有近半个世纪。但至少在国内中文学界,坚持借鉴生成语法研究汉语的学者为数仍少,这可能与汉语语法的某些特点难以直接套用生成语法现有框架有关。沈阳在这方面可说是知难而进,这一章集中了他在这方面一些专题成果。

在结合管约论与汉语实际方面,这些专题研究与海外做汉语生成语法研究的做法不尽相同。其努力的重点,不在于如何通过某种解释让汉语的事实尽量与现有管约理论一致,而是在相关框架下首先尽可能发掘汉语事实,例如借鉴空语类的理论来尽量发掘汉语空语类的种类和出现规则;在事实与理论难以十分吻合时,不怕对现有框架做些微调,甚至修改重要的操作规则。例如,为了在缺少主谓一致关系和动宾粘合关系的汉语中确定动词原型结构而提出的三原则,以及针对“动词套合结构”而在题元之外增加的“系”概念(二元双系动词、二元多系动词等)。甚至为了解释某些汉语结构而提出向后移位这一生成语法通常不允许的句法操作。这些“汉化”处理的利弊得失,很值得有关专家和读者们讨论,因为它们事关如何处理理论方法的系统性和如何尊重语言事实这些更基本的问题。

邓思颖的第五章,通过与以往模型(尤其是“原则与参数理论”)的比较,重点突出“最简方案”的一些新观念新处理,并讨论这些新的处理对汉语研究带来的启发或推进,是非常前沿的探索。本章说明,最简方案的精髓就在一个“简”字。“简”的含义就是理论的经济性,即“方法上的经济”和“实体上的经济”。最简方案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往模式的处理,而只是对原有分析模式加一些限制,减少不合理的假设和武断繁复的处理,以符合“简”字的要求。因此,现在的生成语法研究,很难简单地划清哪些是最简方案的,哪些是管约论模型的。作者对最简方案在汉语中应用的展示,首先是对某些现象和规则进行新的解释,如从经济性角度发现和解释话题化移位所受的一些限制,包括韵律限制。其次是以他人和作者自己的一些语言方言比较研究为例,遵循最简方案指导下的参数理论,用设立尽可能少的参数来统一解释语言方言之间的诸多句法差异,以收以简驭繁之效,如不同方言之间在小句内语序方面的差异。

李宝伦、潘海华合作的第六章介绍形式语义学内一个很新的分析框架——基于事件的语义学。形式语义学作为形式语法之树的语义学之枝,重点关注与句法有关的语义问题,用数理逻辑的形式化分析来刻画句法结构的语义特征和语义关系,反过来也能深化句法本身的研究。对形式语义学的整体,本章作者之一已有合作专著介绍(蒋严、潘海华 2005),本章则集中关注该书中未及细论

的事件语义学。“事件”以前在汉语学界基本上不被看作是一个语言学的术语,近年来,汉语语法研究中关注事件类别的论著开始显现,尤其在时体、构式等领域,因为以事件为观测角度可以看到很多单纯从某级语法单位(如VP、谓语或小句)出发所难以看到的现象和规律。但是,目前内地的研究对事件的关注还是相当初步的,对海外事件语义学方面的最新成果和思路还很少了解,至于对事件的形式化处理还鲜有触及。本章以简明的语言和用例为我们介绍了形式学派的事件语义学的最新成果,特别是谓词的论元结构中“事件元”的添加及处理事件元与其他论元或非论元修饰语之间关系的不同方式给谓词及小句语义关系的形式化处理带来的关键性进展,例如对使役结构、体算子、感知报告等语法现象的研究的推进。两位作者努力将这些新的思路与汉语现象的分析解释结合起来。当然由于汉语学界目前对这些前沿理论还相当陌生,它们与汉语事实更深切的结合还需假以时日,这也是本章作者在结尾处所表达的希望。

蒋严所写的第七章,介绍形式语用学尤其是其中新近发展起来的“显义学说”,同时讨论了这一学说对汉语配价语法研究的推进。语用学是一门年轻学问。“语用”二字有时被一些人用在不严谨的含义上,成为语法研究的杂物箱,举凡句法上说不清的现象,就往里一扔,而未必给出所谓“语用”的确切规律,间或来几句随文释义的特设性解释。蒋严的介绍显示,即便是语用层面的现象,也可以进行系统的分析概括,甚至加以形式化,是谓“形式语用学”。而所谓“显义学说”,是属于“后格莱斯语用学”的关联学派对语用学大家格莱斯(Grice)的会话理论及其后来的“新格莱斯语用学派”的挑战。格莱斯一派的关键之处是区别“直陈义”和“寓义”(或含义)。而关联理论发现,所谓的直陈句,也有很多未说出的可以靠推理扩展而明示出来的意义——显义。作者介绍了显义的特征和种类,分析了显义与原句的各种逻辑关系及其形式化表征。然后本章将汉语配价研究成果与显义理论相结合。汉语中不乏价多位少的包含“隐性配价”的句子,将隐性配价充实为显义的过程就是“显谓”,又称为“语用配价”,而焦点化、话题化在这一框架里也常成为服务于显谓的一种手段——话题或焦点位置可以用来放置因位少而被挤出必要论元位置的成分(这在第四章中属于“动词套合结合”,读者可以比较两种分析法的各自特色)。“显义”学说与汉语配

价研究的结合是作者富有创意的前沿性探讨,很值得关注。

袁毓林所写的第八章,分析认知科学的成果如何促进汉语的研究并最终服务于汉语的计算机处理。此章对认知科学诸领域的简要介绍,在寻常语言学著作中难以看到,在认知科学著作中又显得庞杂艰深,因作者有针对性的介绍而让语言学人相对容易接受。作者指出“认知”是为在作为器官的大脑和作为人的能力的“心智”之间填补鸿沟而架设(假设)的中介平台,以此解释意象、图式、范畴、原型、命题、脚本、网络等认知结构和记忆、编码、搜索、思维、概念形成、扩散性激活、缺省推理、隐喻投射、语言理解等认知过程。接着作者一方面沟通认知与计算及计算机应用,另一方面沟通认知与语言及语言研究,从而让认知又处在语言与计算机处理的中介位置。作者以空语类为例,介绍了多种角度的认知实验来验证这个语言学概念的存在和人类语言对空语类的处理方式。然后作者把重心转向计算,以实例说明为了让计算机模拟人的认知,语言学可以做些什么,计算语言学应当如何应用语言学成果。本章内容并不与国内外某种单一的现成理论框架直接挂钩,它包含了作者对多门学科的综合与整合,这是本章的特色之处,文末提示为了从事此类研究需做哪些学术准备,也就因此而非常实用。

笔者撰写的第九章讨论以跨语言研究为特征的语言类型学与汉语研究的关系。语言类型学常被归入功能学派,也确有不少功能学者从事类型学研究,但有些重要的类型学家并不像功能学者那样与形式学派观念对立(如 John Hawkins),还有些形式学者从事大量的类型学研究(如 Ken Hale)。因此作者认为类型学更多地是以自成范式的领域和方法为特征的学派,以此独立于形式、功能两派。由于本章作者的《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不久前刚出版,其中已有对此门学科尤其是语序类型学的基本介绍。为避重复,本章着重从方法论和操作性的角度介绍类型学,多为前书中谈得不多或不系统的部分,分为选题、取材、比较、归纳、表述、解释这些步骤逐一介绍。然后作者通过研究实例分析类型学与汉语研究结合的已有收获和广阔前景,既强调类型学可以促进汉语研究之处,也强调汉语研究可以为类型学的发展完善做出特有的贡献。主要讨论的是在前述专著中未谈或少谈的课题和成果,如词类(特别是形容词问题)、形态

范畴、状语语序、关系化结构和差比句等。

语法化是目前国内汉语学界的热点领域。早先沈家煊、孙朝奋等开始介绍有关学说和论著时,汉语语法化研究还很薄弱。现在我们已有条件将“原味”引入与本土研究更好地结合,吴福祥写的第十章就适时地担当起这一任务。语法化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语法的历史演变,但语法的历史演变的研究并非仅有语法化一种路数。因此,当代历史句法学的其他一些方面也纳入了本章的视野。本章显示,语法化理论具有功能语法的学派色彩,如对语法/句法非自主性的强调,对认知、话语、语用在句法中作用的重视,原型范畴观,共时与历时的联系等等;而历史句法学则是一种学科和领域范畴,在理念方法上存在着形式和功能的不同倾向。前者主要从(天赋的)普遍语法和语言习得的角度来思考解释句法历史演变,后者则主要是“语料驱动”的、从语言应用出发来考察历史句法现象。此外也有基于跨语言比较的不同于前两派的理论。本章的内容相当系统,又针对汉语研究现状而突出重点,如结合“了”的虚化强调语法创新(演变的发生)和语法演变(包含演变的发生、扩展、扩散及完成)之别,以实例来分析接触对演变的影响,从语言共性和方言比较角度总结演变的类型特点等。

前面的各章都是以广义的“语法”为中心的内容,接下来的5章则属于广义的“语音”研究的范畴。按当代国际术语的常规理解,“语音学”(phonetics)就是实验语音学,因为已经没有了不基于声学、发音或听觉实验的语音学了,因此实际上无须加“实验”二字。考虑到国内现状和习惯,“语音”仍取其早期理解,不等同于只偏重其可验证的物理、生理属性的 phonetics,所以朱晓农撰写的第十一章标题中仍称为“实验语音学”。以讨论音位和音系的结构性系统性属性为主的学科,国际上称为 phonology,本书按通行常规称为“音系学”,王洪君、蒋平所写的两章均属此范畴。其实颇有学者(包括第十一章作者朱晓农)将 phonology(不管其共时历时)就称为“音韵学”,而且确有帮助,如说特定语言中某个具体音的 phonological feature 或某条规则的 phonological constraint,就不方便称为“音系特征”或“音系限制”,而称为“音韵属性”、“音韵限制”较好。但考虑到“音韵”在汉语学界的强势理解,我们暂时还是把“音韵”一词主要留给历时研究,属本书中麦耘撰写的第十四章的讨论对象。谢留文撰写的第十五章,整体

上是讨论方言研究的历史层次分析法的,但其中内容主要涉及语音/音韵的历史层次,所以也是广义的语音研究。

实验语音学长期游离在众多语言学家关注的视线之外。现在条件改善,众多语言学科点在“大兴土木”之时不忘投资建设语音实验室,但人们是否都很清楚实验语音学与语言学其他领域的关系,仍是一个问号。朱晓农撰写的第十一章的一大内容,就是用实例解答这个问题。例如有些语音的共时变异或历时演变,虽然可以用音系规则或公式进行刻画,但本质上仍是描写而非解释,而语音实验却能对这些变化的机理作出落到实处的解释,特别是能够用来统一地解释一些跨语言的共性、倾向和某些不规则的历史现象,如软腭浊爆音的常见空缺和上古群母[g]洪音字并入中古匣母的现象。本章的另一大内容,是说明实验语音学的近期进展所带来的更新语音学术语系统的需求,展示术语更新对深化汉语语音知识的硕大作用。本章最富有作者创意之探索,则是借鉴 Ohala 的方法,用在实验语音学中得到的规律重现汉语历史音变的若干现象或规律。此外,实验语音学对方言学的作用和对形态语义的作用也富有新意(后者其实在音—义关系层面反映了认知语言学所强调的语言的象似性)。

王洪君所撰写的第十二章讨论生成音系学理论,这是生成语法之根在音系学树上结出的果实。生成音系学历经经典生成音系学和非线性音系学两个阶段,现在音系学虽已被认为进入了优选论时代,但作者指出生成音系学至今仍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这也是本书设立此章的原因所在。生成音系学在汉语研究中成果较丰富,因此本章对有关理论方法的介绍与汉语的分析紧相交融,展示了生成音系学框架对于揭示汉语事实和规律的重要作用及需要修正补充的一些观点。例如,生成音系学注重区别纯音系层面和音系与词法句法接面,因而能对众说纷纭的普通话中元音音位和儿化韵等作出更加一致而简单的处理。再如区别于表层结构的深层音系结构能够更好地反映与历史音韵和方言的联系。作者也介绍评说了在韵律模块说、韵律层级说影响下汉语音系研究的重要发现,包括作者和张洪明等对韵律词枢纽作用普遍性的质疑或修正,作者强调了韵律字这级单位在汉语中的作用,也介绍了陈渊泉的不同方言不同变调域的发现。此外,还从音系学角度比较评说了语音的各种声学分类、生理分类以及